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六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二九期（zk2007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述评】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一）	杨 隽
【往事非烟】	文革琐记	于光远
【不堪回首】	刻骨铭心的岁月——在父亲田家英离去的日子里	曾 自·曾 立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述评】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一）

· 杨 隽 ·

一、问题提出

“派系分化”或者说“派性”（factionalism）问题是红卫兵运动（也可以说是群众运动）中的一个核心问题，〔1〕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围绕着同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人为什么会分成不同的派系？这些人又是如何分派的？海内外的研究者们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成果，尤其在西方，其研究范式已经经历了一次转型。但是，这些研究都缺乏对派系本身的考察，尤其是缺乏对保守派的研究。事实上，只有深入派系本身才能更进一步地回答人们为什么分派？又如何分派？才能更贴近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在范式的转换中逐渐远离历史真相，成为理论的游戏，使整个研究误入歧途陷入停滞状态。

现有研究认为“老红卫兵”（北京人又称“老兵”）即是保守派中一支较为特殊的派系，它是最早兴起的红卫兵，以八一八毛泽东接见为标志，主要由中学的干部子弟构成，基本只在北京有，存在时间并不长，大概半年左右，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既有保守派的一般特点，保卫既有政治秩序，又有造反派的一些特征，在客观上“推进”了文革及红卫兵运动。这种特性在北京表现的尤为明显，因为只有北京的中学里才能聚集起如此之多的干部子弟。况且，北京的“老红卫兵”又与文革初期的众多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如对联——“血统论”争论、“破四旧”运动，“红八月”暴力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涉及北京“老红卫兵”，但或是浅尝辄止，或是点到即止，没有进一步地深入下去。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量翔实比对资料，力图超越“造反”与“保守”之惑，跳出“社会冲突论”与“反社会冲突论”之争，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的真相，并对“派性”问题做出一点探索，希望能推动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研究现状回顾：一个中外学术史的评述

1、西方老红卫兵研究评述

文革研究肇始于西方，自然，作为文革标志性事件之一的红卫兵运动也早早地纳入了西方学界的视野，尤其是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最早得到学者探讨，比如，在红卫兵运动尚如火如荼的1967年，易社强（John Israel）就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Red Guar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hinese Youth Movement”的论文，探讨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勾勒了到1967年为止的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基本过程，并认为红卫兵运动的重要性到1967年年中的时候已经降低了。他还特地指出了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的不同，北京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之间的矛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将红卫兵运动和德国纳粹的冲锋队、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国王朝官僚机构中的御史台、国民党的“蓝衣社”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进行了对比，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认为用这些类比红卫兵运动都不合适，红卫兵运动有着自己继承自共产主义革命的独特逻辑，不好随意比较。（2）以今天的眼光观之，易社强的论文也不算离谱，对红卫兵运动的评价和观察也还大致准确。不过，西方在六十年代的研究主要还是时事政策研究，谈不上学术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供政府决策层阅读的马可波罗文件（The Macro Polo Papers），（3）这个系列的文件是文革爆发之初到尼克松访华前，西方最好的对文革的解读。（4）更重要的是，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这个时候的西方学术界往往不得不借重于来自日本的二手资料了解红卫兵运动，（5）这种情况直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Eugene Wu）受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简称JCCC）之托牵头组建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简称CCRM）才得以改变，大量由美国政府收藏的有关红卫兵运动的资料以胶卷的形式流通于美国各个大学之中，（6）西方学术界可以直接接触到原始材料，这就为七十年代中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USC，University Service Centre）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最接近中国大陆的落脚点，使得西方学者可以直接采访从中国大陆逃港的难民，（7）这些难民中不乏在派系斗争中失利的红卫兵，（8）有些人甚至是红卫兵派系里举足轻重的人物，（9）这些当事人的叙述毫无疑问的为西方的红卫兵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如此的资料准备，加之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巨大发展，（10）正如安戈（Jonathan Unger）所说“从七十年代中期到末期，许多有关六十年代文革的重要著作纷纷面世。”（11）红卫兵运动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诞生了西方的第一个研究范式——社会冲突论。

社会冲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鸿永（Hong Yung Lee）、骆思典、陈佩华（Anita Chan）（12）、安戈等。（13）其中，李鸿永写于1975年的论文是开山之作，（14）而骆思典等人紧随其后的论文和著作则是进一步为“社会冲突论”奠基。（15）李鸿永的论文和著作并没有完全地将视野转到红卫兵运动本身之上，还在试图构建一个能够将高层与基层贯通的宏大理论模型，而骆思典等则把笔墨都放到了广州的红卫兵运动本身，将广州中学的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分析的是一清二楚条分缕析。（16）在材料的运用上，李鸿永偏重于红卫兵小报等文字材料，而骆思典等则较好的将口述和文字资料结合起来。虽然社会冲突论者之间有所差别，（17）但总的来说，通过他们对北京和广州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的解释范式，而正如董国强所指出的，这个范式的基本观点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基于家庭出身、个人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在现行体制中享受特权、得到好处，另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则在现行体制中遭到排斥、到处碰壁。因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那些受到排斥的社会群体成员便成为‘造反派’，而那些得到好处的社会群体成员则成为‘保守派’。两种社会势力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形成冰炭水火不相容之势。”（18）这种范式很有效的解释了中学红卫兵里的派系分野，其中骆思典最严密地论证了这一观点。通过对广东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他发现文革之前的教育以家庭出身将学生分化成了两大互有敌意的群体，在文化大

革命开始之后，中学里的学生就沿着文革前的分野，形成了保守和造反两大派系，这两大派系互相冲突，构成了广东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基本内容。可以说，骆思典的研究是社会冲突论者中最扎实的，近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谓“前无古人”是因为李鸿永在论证和材料上远没有达到骆思典那样严密的程度，骆思典不仅仅做到了平衡口述和文字材料，还采访了保守和造反两派红卫兵，最后的结论上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自洽观点。而“后无来者”则是据笔者目前眼力所及，海内外尚无任何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博硕士论文超越了骆思典对广东中学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学红卫兵两派起源问题上。可以说，社会冲突论对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分派研究是最严谨的，而老红卫兵们则被理所当然地归入到保守派阵营之中。（19）但是，社会冲突论在解释其他社会群体的分派上就不那么有效，甚至对大学生分派的解释也是很不足的。尽管骆思典（20）已经注意到大学分派跟中学分派的不同，（21）但是他也没有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大学分派不同于中学分派，（22）而这就为新的解释提供了空间。

尽管学界对社会冲突论的批评早已存在，如1990年澳大利亚学者傅斯德（Keith Forster）（23）就指出“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概念本身过于武断，浙江两大主要派别的头头们在运动初期都有向其所在单位当权派造反的经历。导致他们分裂的唯一显而易见的因素，是在省委领导人中支持谁、反对谁。”（24）又比如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林伟然，他指出社会冲突论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对资料的曲解，李鸿永和骆思典所列举出来的数据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他认为派性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点，其派性认同是会不一样的，而社会冲突论则把它理解成了一个静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也是社会冲突论的第二个问题，社会冲突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有问题，文革前的社会矛盾并不是引发文革的主要原因。另外，失利和得利阶层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若是放眼整个社会，这一划分未必正确，因为当时受损最严重的是黑五类和农民阶层，但是农民阶层恰恰是文革中是最保守的，也就是说社会利益并非分派的最根本原因，为此，他列举了五个影响人们分派的因素。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分派法，即阶级斗争理论分派法，林伟然认为毛泽东有个毛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同于文革前主流的阶级划分法，而文革中接受了毛泽东的阶级理论的人就变成了造反派，而没有接受的人就变成了保守派。（25）然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形成一个挑战社会冲突论的解释，（26）加之社会冲突论者基本都离开了文革研究领域，红卫兵运动研究陷入停滞，故而社会冲突论一直是主导范式，直到原社会冲突论者魏昂德（Andrew G·Walder）于本世纪初期“叛变”，对社会冲突论“反戈一击”，这才使得新解释浮出水面。

从2002年开始，魏昂德通过一系列的论文来挑战传统的社会冲突论观点。（27）2009年出版的《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则是最终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通过主要分析北京的大学红卫兵运动，魏昂德认为一个人的政治出身，和其最后是否加入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没有必然关系。社会冲突论所隐含的前提，即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所处的社会位置“理性”地选择自己的政治行动，是错误的。因为在1966年这个政治环境剧烈变动、政治前景模糊不定的时间点上，人们是无法理性计算自己应该采用要采取的政治行动策略。魏昂德还进一步提出多变的政治环境才是决定分派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冲突论所得出的派系的社会起源并不是分派的原因，是分派的结果。（28）由于否定了社会冲突论，在魏昂德的解释里缺乏对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定义，（29）故而在《分裂的造反》一书里涉及中学的部分，一直被社会冲突论者视为保守派的老红卫兵（30）也成了造反派的一员，而所谓的保守一词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及其所支持的造反派对他们妖魔化的结果。（31）可事实上，很显然不管是老红卫兵还是造反派，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意“老红卫兵造反”说，（32）总的看来，魏昂德对中学红卫兵运动及老红卫兵的研究并没有超越社会冲突论，他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中学的红卫兵运动分派会不同于大学红卫兵分派这个问题。事实上，魏昂德的前提也有问题，文革初期的环境真的就是不确定和多变

吗？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是如此，但对于信息量远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干部子弟来说，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然而，魏昂德在中学红卫兵运动部分并没有把这点考虑进去，而完全采信了老红卫兵的口述，这使得他的论述实际上是偏向老红卫兵群体的。另外，魏昂德在批评社会冲突论时忽略了社会冲突论的另一个前提，即实际上社会冲突论要解决的是普通大众为什么参加这一派而不是参加那一派，并不仅仅是运动中的精英分子为什么会分成这一派而不是那一派，如果撇开群众组织中的一把手，稍微统计一下各派系中的普通成员状况就会明白其实社会冲突论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存在着种种不足，因此，在2016年西雅图的亚洲年会（AAS 2016—Seattle）的讨论上魏昂德的观点并未得到其他学者的遥相呼应。

〔33〕不过，魏昂德对“社会冲突论”的批评却也反映出简单的利益集团论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复杂的文革和红卫兵运动。

在老红卫兵问题上持与魏昂德类似观点的还有安舟（Joel Andreas），他并非魏昂德观点的赞同者。〔34〕在其论文和著作中也一样没有把老红卫兵当作保守派。在2002年的论文〔35〕中，通过研究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他称早期红卫兵运动因为攻击文化资本在学校的特权和权力，所以也是种类型的造反。〔36〕另外，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在安舟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屡屡提及老红卫兵，但是在根据论文修改的于2009年著作中却没怎么提起老红卫兵。〔37〕

除去以上所提到的研究者，西方还有些研究者的著作与老红卫兵有所关系，比如邝泽倩（Julia Kwong）的两本关于中学文革的著作《变迁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幕》（Chinese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Prelud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和《中国学校的文革（1966·5—1969·4）》（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第一本是文革前史，讲述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及教育如何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第二本则是叙述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运动基本过程，总的来说并没有超越社会冲突论的范畴；又比如臧小伟（Zang XiaoWei）的《文革之子：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家庭生活与青少年的政治行为》（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注重将社会冲突论中所提及的阶层进行细化分析研究，同时还把文化和规范设置了一个中间变量，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则是自变量，而政治行为是因变量。这些是社会冲突论所未提及的；还比如大卫·M·拉道克（David M·Raddock）的《中国青少年的政治态度，文化革命在广州》（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chow）和林静（Lin Jing）的《红卫兵的暴力之路》（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家庭和社会政治观念是如何影响中学生在红卫兵运动中的所作所为的。不过，这些著作偏重于社会科学，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读红卫兵运动，虽不乏精彩之处，但终究不过是社会冲突论的进一步细化。

通过以上对西方老红卫兵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西方首创红卫兵分派的研究，以大到一省或一地区，小到一学校为案例，从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出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抓住了中国人“习以为常”〔38〕却未进行深入研究的关键特征。然而，西方的红卫兵运动研究缺乏对派系本身特别是保守派的深入细致的考察，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整个研究无法继续深入突破，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已然不大，从2016年西雅图的亚洲年会上的讨论也能看出此点。〔39〕加之文革研究的热潮〔40〕早就已经过去，很多社会冲突论者转行研究其他课题，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在西方陷入停滞状态。派性（factionalism）问题的研究成为个别研究者的“独角戏”。

（未完待续）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启之主编，2019年11月

~~~~~  
【往事非烟】

文革琐记

• 于光远 •

◇ 第一次挨斗

“阎王殿”的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二阎王是周扬；老阎王还有张子意、张磐石、李卓然、许立群、林默涵，姚臻是刚刚提拔的副部长，也是阎王；童大林是小阎王，因为他是刚刚提拔的秘书长；其他的处长副处长是判官；还有一些特殊一点的处员是小判官。这就是中宣部阎王殿领导班子的阵容。

我与别的判官不同，在中宣部，我只是个处长，但我是“副部级”，所以，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大判官”。在内部开斗争会时，我终究只是判官，地位不算高，但是阎王殿名声在外，大判官的地位也算高的了，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和经济研究所，我也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

第一次使我认识自己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事件，是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斗争会。那次批斗的题目是阎王殿在经济所搞“假四清”，包庇孙冶方。这事跟我本来没有关系，那时我在通县农村搞社教，不在部里。所以一开始斗的时候，他们没找我。但我英明地预料到，他们是不会饶了我的。那时家中的电话还没有拆掉，我就坐在家里，等候“传斗”。果然，电话来了。我去了。

斗争会上，我成了与那件事完全无关的主要斗争对象。那天，站在第一排戴着高帽子挨斗的是三个人，按顺序排第一的是张闻天，第二是我，第三是孙冶方。直接有关的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中宣部的、学部的和经济所的反面站在后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挨斗没有多少经验，我抱着考验一下自己耐力的心情，一丝不苟地参加了斗争会。我那时候还不懂得怎样找机会伸伸腿，直直腰，而是硬碰硬地弯着腰听长篇大论的罪行控诉。我居然坚持了下来，而站在后排的人，斗到半截，就有两个坚持不住了。只听见“嘭”一声，人倒了下去，紧接着便是一片骚动，可斗争会还得继续。当时，我对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力颇为得意。斗争会上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是用全部注意力在作一种体力上的磨练，而且成功了。当有人对我们喊“滚吧”的时候，我拔腿就走。大家发现我突然不见了的时候，我已经跳上回家的公共汽车了。

大概是因为走得太快了，中宣部的同事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赶到了我家。而那时，我已经坐进洗澡盆，浑身泡在一池满满的冷水里了。

当时，因为天气热得要命，加上斗了半天……

◇ 头发的故事

个人的尊严，大概与一个人的头是很有关系的，而一个人的头上，除了五官以外，就是头发了。如果穿一身好的衣服，没有一头好的头发，总觉得有些遗憾；买一个假发套，如果与身份气质不符合，也会使人倒胃口。可见头发确是很重要的。

文革开始，我还有一头完整的头发。

有一次，学部的人到中宣部来造反。其中一个女的看见我的头发依然完好，于是对我大喝一声：“好！于光远，你还逍遥法外！”

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她已经上来，“咔嚓！咔嚓！”对我的头“开刀”了。原来，这也算革命的一个项目。她的手里早已预备好一把很大很大的剪刀，逢“牛鬼蛇神”便要“剃度”一番，然后对着你喊一通口号，再扬长而去。

我看自己的头实在不好看，就到中宣部的理发室请他们重新理一理，没想到他们好像也有气，把我的头发理得乱七八糟。

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到家里。我夫人从外面买回一把理发推子，把我剃成了平头。从此以后，我的头发都是我夫人帮我理的，几十年下来，倒省了一笔洗理费。后来我跟她开玩笑说：“多少年了，我该付你多少款呀？”

这事使我想起清朝有一首“流行歌曲”，不过可能有词无调，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剃头歌》，“歌词”是这样的：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  
有头皆须剃，不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清朝统治者实行“留发不留头”的专制政策，太平天国的造反者为了表示反抗，依明朝习俗留发，所以谓之“长毛”，这在满清统治下是要杀头的。这也是说明头发的重要性的一個例子。

有意思的是，后来夏衍将这几句话改了，用来形容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很有新意：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我把它取名叫《整人歌》。

#### ◇ 免遭抢夺之苦

文化革命中的两派竞争是很激烈的，抢人，是这种竞争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内容。

有一天，北京对立的两派同时各要开一个批斗大会。一个是全北京的“地派”批斗大“走资派”的一个联合行动，属于地派的学部的“联队”，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还有一个，是属于“天派”的学部的“总队”，以批判学部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为由头斗争走资派。为要使批斗会开得有声势，被揪到会的人物的级别和知名度，是体现“革命”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我们这些“革命对象”事先并不知道。

大会的前两天上午，我听说学部哲学所要斗我，就跟着一个前来押送的人，到学部去了。学部当时是有名的“斗人”的机关，这次主要是斗我，我以为总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可是，没想到批斗会开得很稀松，精神也涣散，发言缺少内容，说话也没有什么力量，陪斗的只有一个“小判官”龚育之。斗完了，我们就回家了。过一天又通知我，哲学所还要斗我。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押送我了，从沙滩到建国门，走起来花的时间太多了，我自己骑自行车去吧。也许是我这人有守信用的信誉，他们也乐得轻松，也就同意不来押送了。我骑车去了之后，发现这一回连陪斗的龚育之也没有了，心中不免有几分寂寞。斗争会开得比头一天还稀松，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

开过斗争会后，还不让我走，中午还要留我吃饭。吃完饭也不让走，说是要我写检讨，交代问题。

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里，刘、关、张、杨（即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杨述，当时都是学部的领导）都在，加上我，一共五个。我们一人一张桌子。一个红卫兵跷着“二郎腿”命令我们：“你们写！”

写什么呢？我们都不清楚。杨述便去问监视的造反派。那人一听，勃然大怒：“你自己的罪行你还不知道？还来问我！”

原来，我们只要动笔就行，至于写什么，谁也不知道。

大概是杨述提了问题，那个红卫兵就走到他跟前看他都写些什么。没想到，他写的竟是自己和号称“独立王国”的北京市委进行斗争的光荣经历。那人一看，又火了：“你还有斗争？这不行。检讨就是检讨，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

到了晚上，还不让我回家。说是明天另一派要斗我，会狠狠地整我的，他们自称有责任“保护”我。我有点着急了，于是说，出来时没有给家里打电话，问“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回家？”“可以”，网开一面！

我被送到王府井北大街的历史所、考古所那个地点，被安置在一个人的宿舍里。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但不久我就发现，好看的东西不少。比如像首长讲话之类的东西，那时我们这样的人都是看不到的，于是我一个人大饱眼福。

后来，我又被紧急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好容易挨到了天色擦黑。这时，被捕获的其他“猎物”也一个一个地来了。来人中有张闻天、李维汉、杨献珍、孙冶方、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过夜，睡统铺，一张木板床。李维汉、杨献珍就睡在我旁边。天气冷极了，穿上了大衣，上面压了棉被，我们还冻得直发抖。

第二天早上也没人管，只不准我们出院子的大门，我也就看了看院子里的大字报。吃了早饭以后，我们又被押上了轿车，只知道是继续接受批斗，但不知道会送到哪里去。

马达一响，我们所有人的情绪都莫名其妙地被调动起来，有的是紧张，有的是兴奋。我感到，电影中的情景出现了，我们的汽车一开动，立即，后面就有汽车跟了上来，我们加

快，它们也紧追不舍，绕来绕去，最后跑到了工人体育馆。我们的汽车刚刚停下，后面的汽车已“咬”住了我们的尾巴。车门开后，大家一跳下车都使劲地往体育馆里跑。我的腿脚比较灵便，三步两步就跑进了门去。可惜张友渔动作太慢，后面车里冲下来的人将他一把抓住。我回头看时，我的这位“难友”虽说不上是被五马分尸，但已被两边的人各持一端，“抢”开了！

最后，大概是“抢方”的人力不足，张友渔终于被夺了回来。我虽没有帮上“难友”的忙，但还是舒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免遭抢夺之苦。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头一天斗我们、写检查都是假的，目的是把我们都垄断起来，用以显示他们这一派斗争的实力。

进到体育馆中，果然感到斗争的气势不凡。这是全北京“地派”的一次联合行动，把当时最著名的“黑帮”都揪来了。打头的是彭、罗、陆、杨（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面还有李维汉、张闻天以及一些大一点的人物。我排在差不多中间，排在我前头的是蒋南翔，后边的是杜润生，我们后面还有不少人。每一个黑帮配三个押送的红卫兵，服装一律草灰色，人都是棒小伙子。在他们把自己分管的那个黑帮押送到位之后，三个人中，左右各一人把黑帮的手往后尽量抬起，中间的那个人使劲地把黑帮的头往下按，这就是当时盛行的“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我在文革中坐过许多次这样的飞机，比较起来，这是最正规的一次。这时，一个人会感到腿上与颈上的筋受力最重。

斗争会开始后，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叫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上去，全场这时高呼口号，烘托气氛。等那人站定以后，便有人批判发言，发完言又是口号结尾。他完了以后，就是下一个。下一个进行时，前面的都不能走。直开到最后，五十多个人把场子都站满了。斗争结束，后上来的人先退，也是口号不断。如此下来，官越大，到得越早的，坐“喷气式飞机”的时间越长。“问题”越轻的人受的惩罚也越小，从中也体现了一种“公平”。

当时室内温度很高，我被押着，眼镜、笔记本掉到了地上，前面汗水湿了一滩。但走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我，倒有一点一丝不苟的味道。

那一次挨斗真累！当斗完我，我回到海军大院去取自行车时，几乎骑不上去了，还是站在马路边的台阶上，跨上车子，我才得以把车骑回家去。

后来我们了解到，被他们的对立面抢去斗争的人，并没有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被狠狠地整，还没有我们吃的苦头多，但我觉得，我还是不亏，因为说良心话，那差不多是我经历的文革的无数次批斗会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次。

#### ◇ 讨厌的“请示病”

我们这些“走资派”的“上级”红卫兵，是经常调换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来了个姓张的，对我们说：“你们这些破烂，都归我了。”他自称是北师大，我们猜想，我们已经被“移交”给北师大谭厚兰这一派了。

移交以后，他给我们定了规矩，每天都要写认罪日记，每天写每天交。他在上面经常批示的是三个字：“不深刻”。交日记本时要交到他手上，可他还给我们时，却是扔在地上，让我们各自去找。训话的时候，他常采取一种不可一世的派头：两腿叉开，双手叉着腰……

在他给我们规定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每天打扫厕所。



那时的中宣部大楼，早已成为革命群众的革命据点。全国各地来的人，在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办公室的门锁着，人们就从上面的玻璃窗爬进爬出，晚上住在里面。厕所里大便堆得老高……那位张兄给我们布置工作时说，每天看看这厕所，就知道你们自己的思想有多脏，可以很好地得到教育。

我们“黑帮”中有个小判官，算是“黑帮队长”，听完训话以后，他问了一句：

“星期天要不要打扫？”

“要，要打扫！”

这下把我们气坏了！你不问这句话，我们就不打扫了，星期天还可以偷点儿懒，同家人多聚一会儿。你这么一问，反惹出麻烦来，人家能说给黑帮放假吗？

在这之后，我就在自己的头脑中明确地形成了“请示病”这个概念，把本来不该请示而非去请示视作一个人的病态心理。我认为，一件本来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不经请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则，而且正是组织要求于一个工作人员的。这表现他是否起码称职，是否敢作敢为和勇于负责。不该请示的事向上级请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级意见，实际是责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负责任。我这样的观点可以说和打扫厕所这件事毫无逻辑关系，因为“黑帮队长”的差事，本来和权利义务一类的概念挂不上钩，我只是因为他的一句请示带来的麻烦有感而发罢了。

事隔多年，我又一次想起这么一件事：十年前，我到甘肃的酒泉师范去参观。这个学校在当地还算不错的。当地的驻军和企业，想和学校合作办一个幼儿师资班，他们愿意出钱，也愿意包学生的分配。学校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愿意去办，酒泉地委也同意，但是学校还去请示省教育厅，教育厅居然不同意。校方接待我们一行人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必考虑省教育厅的态度。陪我同行的正好有一个甘肃省委宣传部管教育的副部长，他同意我的意见，告诉学校可以办这个班，这件事到此也就算解决了。

回到兰州，当时的甘肃省长陈光毅要我向兰州的干部作报告，我就对他讲了酒泉师范这件事；并且告诉他准备在报告中反对一下请示病。在这次讲演中，我忍不住给他们讲了文革中的这个故事。不过，我郑重声明，这不过是心理学上的一种联想现象，本质上两件事是根本不同的，千万别误会。

后来看《南风窗》，见到那上面刊有一篇许士杰写的反对“请示病”的文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 ◇ 摸一下“老虎屁股”

文革中北京有一个著名人物，此人姓吴，是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中央文革的成员）在学部的一个著名打手，也是学部造反派“联队”的一个头头。建国后，吴在国务院“八办”工作，喜欢写些文章，文章写得还可以。他想到学部工作，我是同意的，我同他始终没有什么矛盾。

我处理过有关他的历史问题的事情。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写“九评”时，我和一些同志住在钓鱼台。有一位同志找我，说吴在政治上不可靠，解放前他在武汉有许多可疑的事情。我向领导汇报后，传达领导意见，要这个同志写一个书面材料，结果那位同志又不肯写。我于是告诉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要他认真去查。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杨述没有把查的结果告诉我，而吴却因为毛主席的有个讲话没有让他听传达，很不满意地找到了我。我对杨说，你们抓紧查，免得工作被动。杨告诉我，已经查出了，吴是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党证。这话是一九六五年冬天对我说的，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文革发动后，中央文革小组就看中了吴，他一下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学部召开的批判我的第一次斗争会上，我进场前就看见他站在场外指手划脚，显然是这次批斗的组织者。

当时，《中国青年报》有一个人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吴有反对“大跃进”的右倾言论。说他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一九五九年时还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大跃进！”这本是“革命群众”之间的斗争，与我们这些走资派无涉，但吴指使学部几个受蒙蔽的青年人贴出大字报，说那话不是吴说的，而是于光远说的。这下，就把战火烧到了我的身上。

我本来对吴这个人的历史问题还只是怀疑，因为杨述只是对我说了那么一句话，以后又没有下文，而且文革中吴的对立派中有很多是学部政治部的人，他们对干部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他们给吴贴了许多大字报，但没有人说吴有历史问题。所以，我对吴的看法，那时也只是止于怀疑。但这事使我敢于断定：他不是个好人。人家揭发你，你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要转嫁到我的头上？你让几个年轻人贴大字报，可是他们在一九五九年时还没有到学部来，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根本没有资格说大字报上的那些话。吴让这些年轻人出来贴大字报，是一种很不正派的行为。我一气之下，也根本没有考虑“老虎屁股”摸得摸不得，没有去考虑得罪吴传启，就是得罪王、关、戚，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现行反革命！

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准备贴出去。

但我的大字报还未贴出，经济所一个了解我和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战斗队就贴出了替我“解围”的大字报，说于光远的观点是“商品万岁”，他没有“价值万岁”的言论，原先贴吴大字报的《中国青年报》的人，又散发了他的传单，说明他的这个揭发，是一九五九年就向吴的单位揭发的，如果是于光远说的，为什么他不向于的单位揭发，而要向吴的单位揭发呢？这样，这件本来会导致我和造反派正面顶撞的事情，就算解决了，我的大字报也就没有贴出。

这一次，吴这只老虎的屁股没有摸成。不久之后北京矿冶学院的红卫兵来找我外调吴的历史问题。我知道讲这方面的事危险极大，但是我觉得应该把我知道的事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向他们讲清。讲了之后，我一直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吴这派的人会找上门来。我估计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而我，一个黑帮，只有等着挨整的份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什么事也没有，平平安安地摸了一回老虎屁股。

#### ◇ 真诚而错误的检讨

延安抢救运动之前和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看出事物的本质，是在相当晚的时候。在这方面我的“觉悟”总是来得比较迟的。在文革中，我也作过真诚然而后来明白是错误的检讨。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止一件，但是我记得起来，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那就是关于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事。

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酝酿，始于一九五四年，中国科学院、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同志，差不多都认为应该搞。第一步就是制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条例》，这是国务院批准的一个正式的法规，但按照这个条例，研究生毕业并不授予学位，因此还不能说是建立了学位制度。因此接着继续酝酿、起草学位制度的条例。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讨论：郭老提出，相当于现在硕士学位的这一级，毕业可称为“进士”。这次酝酿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后中断了。第二次酝酿是在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以后，又起草过一次文件草稿。这两次酝酿讨论和文件起草我都参加了。

我如此积极地推进此事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个人大学毕业，只能说明他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能说明他已进入学术研究的大门，也不能说达到什么学术水平。而且一个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只学到大学本科毕业也是很不够的，还应该打进一步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用自修的办法去打，学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该为他们创造条件。但是说到这个层次还不能说透学位制度的必要，不给学位的研究生制度也可以起那样的作用。学位制度的必要是要给这样进修达到的程度确立标准。

这样的认识，原先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但是，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学位制度提出批评，说它是“提倡追逐名利”，引导人们脱离政治，走成名成家之路，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那时，我思想上确实发生了混乱：我真诚地认为，那以前我热衷于建立学位制度是“只见树木”（只从发展我国学术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见森林”（不知道必须考虑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作这种检讨，并不是出于什么压力，相反，在批斗中，人们好像并未强调这个问题。如果是人们强迫我作检讨，我就不会真诚地去反省了。

在讲文革中我的故事时，提到这件事，为的是说明，我这个自认为理智比较强，能独立思考的人，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也会改变原来的正确认识接受错误的思想，所以说是一件憾事，而且是对我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憾事。

#### ◇ 二十年前的一笔“帐”

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来审问我：“你要交代你是怎么成了陈伯达同志的老对头、死对头的，首先要从延安时期交代起。”

一听要从延安时期交代起，我心里就明白了。因为在延安，我和陈伯达只有一次接触，没有第二次。当然，以后我们也还见过面，但是没有说过一句话。

那一次唯一的接触的经过是这样的：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分好几次连载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说》的文章，我读了以后，发现文中有错误，就写信批评他，他回信给我，约我到杨家岭他的窑洞见面。一见面他就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有学好，你对我的批评，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终生难忘。”我这个人不喜欢讲谦虚的客套话，不过陈伯达长我十来岁，那时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学者，我还是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青年，他这么讲我还是很高兴。那天我们还随便谈了些别的，然后我就告辞了。

隔了一年，延安把报上的文章汇集到一起，出版了他的这部著作。我得到后一看，竟一字未改，这使我惊讶之至。他对我讲得这么好，而行动上却一直也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对我的批评不同意，尽可同我争论，我也不会介意；如果他不愿同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说一句“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也比这样好。

与陈伯达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虚伪，但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第一次见面就对这一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的一个特殊机遇。

要我交代延安时期就是陈伯达的对头，只可能是这件事。原来我认为他虚伪，没想到在这虚伪之中，还有一句不虚伪的话，那就是“终生难忘”四字。

那次审问，被我用装傻的办法应付过去了。我知道陈伯达不可能源源本本地讲这件事。他说不出口，红卫兵也不可能理解这样的事。我不觉得这次审查有多大压力。可是我夫人后来对我说，她当时知道这件事后，真有点儿为我担心：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大权在握，你得罪了他有你的好吗？的确，在当时，他这种身份的人对我有这种评价，虽说不足以置我的政治生命于死地，也足够使我难以翻身了。不过，那次审问，算是平安地过去了。

一九七二年，我从干校回北京，对我的“群众专政”解除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清华老同学王天眷。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你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吧？我问他此话从何说起。他说，你不是在延安时起就是陈伯达的老对头吗？现在陈伯达倒了，你不就舒服了吗？我问他何以知道此事，他说是从科学院的小报上读到的。原来，有一次陈伯达主张把列宁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中的“气”字改成“子”字，要国家科委党组讨论，我在党组会上发表了基本上赞成对列宁的话进行修改，但只改动这一个字我认为不全面的意见。有人向他汇报我的发言后，他说了“于光远嘛，从延安的时候起就是我的老对头”这样一句话。

原来如此，文革中对我审问此事的原委总算搞清楚了。

#### ◇ 挨打纪实

在文革中，坐“喷气式”飞机的次数，已多得记不清了，但挨打的次数并不多，有过那么几回，但也记不清次数了。

第一次挨打倒还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沙滩红楼后面，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大楼前的五四广场上，靠近中宣部游泳池的地方，就在露天布置了几处审问判官的地方。每处放几把椅子，让审查者坐在那里，被审查者就低头站在他们前面答话。那一天，中国科学院院部研究室的几个“造反派”在那里审问我。一位女性的“造反派”担任主审。我顶了她几句，她就动手打我。一个知识分子女干部，居然动起手来，我是没有想到的，不知她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当时，在旁的几位男性态度倒还比较平和，看得出他们也不赞成那女人的行为。我虽然嘴硬，但走资派毕竟不敢对“革命群众”回手，而且，我还有“好男不与女斗”的思想，所以就忍了。但越是忍，心里越是有气，所以态度就越是“不好”。所以，她最后得出结论：“于光远，你这个人就是顽固！”

事后，说老实话，我对这次挨打还真有点儿耿耿于怀。没想到“冤家”路窄，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又遭遇了。

有一天下午，正下着大雨，我从新布置的设在中宣部传达室旁边的专供外调人员审问我们的席棚里出来，那个女人这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中宣部大院来，正巧在传达室躲雨。她一见我，就在屋里对我嚷：“于光远，你进来！我有话要问你。”

我一看见她，就没有好气，说：“我现在正忙着呢！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她气极败坏地大骂：“你这家伙坏极了！要把你斗倒，斗臭，斗死！”

我一听乐了，嘲讽地说：“你还有新发明呀？我听说过‘斗倒，斗臭’，还没听说过有‘斗死’一说呢！”

说着我就走了。我手里拿着雨伞，而且走得也不慢。她没有冒雨追我。

我还有几次挨打，有的是在外调人员的审讯过程中碰到的。但整个文革期间，中宣部的红卫兵没有动手打过我，也没有打过别人。中宣部的“黑帮”，都是挨外调人员的打比较多。有一个“判官”在挨打的时候用手挡了一下，结果被连打了好几下，批一句就打一下。中宣部的红卫兵站在一旁，没法给这位“判官”说好话。

我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也是在接受外调时。因为我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提供外调对象的所谓“叛徒”材料，结果他们说因为我是叛徒，所以我包庇他们单位的那个叛徒。他们用来打我的东西也有点特别，是一把木制的衣刷子。刷子打在我的额头上，眼部都打青了。去医院看了几次，还做了几天热敷，开了几天病假，脑子倒没有损伤。

还有一类挨打是在斗争大会上，一般是动用拳头，也曾用脚狠狠地踢我。

有一次我挨打之后到北京医院门诊，病历里留下了这次挨打的记录，前几年偶然翻阅自己的病历还看到过它。

许多人经过文革的折磨，含恨至死或留下终身残疾，但我终于完好如故。为此，也有人赠我以“福将”的头衔。

#### ◇ “牛棚”生活

一九六八年底，我们这些黑帮被集中起来，住进了“牛棚”。牛者，牛鬼蛇神也！“牛棚”者，牛之栖息之所也！牛非人，亦即非人栖息之所也。

不过，我们住进去的牛棚，是货真价实的为人居住而建造的建筑物。那是北京车公庄大街上，市委党校内许多建筑物中间的一栋楼房。那儿本来是党校学员的宿舍，文革中学校不招生，大楼空着，就被许多单位用作集中看管牛鬼蛇神的地方。

让我们住进这样的楼房，已经是一种优渥，如果不采取别的办法，那么就无以把“好人”和“非人”区别开来。于是，办法被想出来了：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安排六个人住，房间里没有床，也就是说，不准我们睡床。我们只能把褥子铺在地上，睡地铺。虽然中国远古时代的人不睡床，现在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如彝族、傣族等）和东方的日本人也保留了这种古风，但是，要已经睡到床上去了的人们重新睡到地上去，这就不失为是一种惩罚和污辱了。另外，我们的房间里配给每人一张小课桌，那是给我们写检查用的。但是没有凳子。凳子和床这两件器物，虽然不是历来就有，说不定是否会永世长存下去，但它在大部分人类生活中出现，毕竟是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历来就享用祖先的这些文明成果的我们，突然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才真正感到，自己被当作非人看待的境遇。

除了没完没了的检讨外，就是每天例行的早请罪，晚汇报。地点在我们隔壁的一个洗脸间里，那儿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外调人员对我们的“提审”，有时也是在这儿进行的。中宣部的一个“判官”连续不断地挨外调人员的耳光，以及我挨“板刷”的经历，都是在这里留下的。

有一个对我来说很不习惯的事情是，其他五个人都抽烟，只有我一个人不抽。他们在房间里吞云吐雾，我不得不每天用鼻子吸进他们五个人吐出的烟气。早上洗脸时，一盆净水，把毛巾放进去一搓，立即变成一盆黄水。

一日三餐都是列队去食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放风”的好机会。趁此时刻，我们可以开阔一下视界，瞥一眼院子里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同时也知道在哪个地方有哪些单位的“牛棚”。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和真正的牛棚发生过关系，我当时给五岁半的女儿小东的信里，留下了这个事情的记载。我告诉她：爸爸去一个奶牛场劳动已经好几天了，干的活是给奶牛们修它们跑着玩的地方。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自己的铺盖就铺在土地上铺着的芦苇上面。去的当天打了一种叫“敌敌畏”的东西，苍蝇蚊子都死了，接连三天都没有给蚊子咬。我还告诉她这里的白天很热，晚上却非常凉快，都盖被子，比北京城里好。就是睡得比较挤，一个人只有两尺宽，还有不少人睡着时大出声，说梦话很热闹。在另一封信里我对女儿说，爸爸因为干的活多，吃得也多，一顿要吃好几个窝窝头……

是不是“牛棚”生活都那么难受，那也未必。大家日夜相处，比过去为工作发生联系的彬彬有礼的来往倒是随便了许多，所以我们有时也乱扯一气。有位老兄甚至发牢骚，说自己当年在上海，和江青的关系十分密切，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江青见了他就像是不认识的人一样。面对自己如今沦落的这般田地，想想那个女人权倾一时的情景，少不了有一番感叹。他的这段风流韵事，过去大家都不知道，现在他自己“坦白交代”，大家一下子都议论开来了：

“——要是她现在还记得你，知道你了解她的秘密，你今天还能平平安安地躺在这里瞎扯？”

“——你能有今天，该知足了，还发什么牢骚？”

“——你是不是想要她来‘解放’你？别做梦了吧！”

当时如果室内安了窃听器，那我们六个人准会给打成“现行反革命”。事后想起，真不知大家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

当然，这种“宽松”的气氛，也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出现，如果有外人在，我们便会很自觉地沉默不言，就像一个个标准的“专政对象”。

但我这个人生性爱笑，在“牛棚”也经常哈哈大笑。林润清曾很认真地劝我：“我们过这种日子，有什么好笑的？你这样，别人会说你态度不好。”

我接受他的意见，想想也真没有什么好笑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都会遇到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每当这时，我就又控制不住哈哈大笑一阵。

#### ◇ 抄家和搬家

抄家这样的事情，我过去只从旧小说中读到过，《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小说上说抄家，都是皇帝的极有权威的大臣或亲王主持，规模也是很大的，被抄家者，一般也是极其显赫的家族。这是在政治稳定时期实行“严打”性质的抄家。这种抄家，可以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所以除“株连”关系外，一般涉及面不会很宽。另一种抄家，是改朝换代时期，在社会大动荡过程中的抄家。这种抄家是权力以及与权力相联系的社会财富转移

的一种形式，所以，其规模和牵涉的面一般是很宽的。延安抢救运动时，我虽然也受到冲击，但那时也没有抄家一说。我们那时都是年轻人，生活极简单，也没有什么好抄的。可是，文革以后，这种历史上存在，和我们的生活似乎隔得很遥远，在我们的意识中本是那么陌生的事情，一下子变得现实了。

不过，文革一开始，抄家之风还没有波及我们这种“革命干部”的家庭时，我对此已经有所准备了。我把一些重要的文件正式上交了中央档案馆，同时，自己对一些在新的眼光下看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先来了个自我革命，包括一些私人信件，我也不再保存。处理完后，我便等待着这种事情的来临。

住在沙滩中宣部大院时，我的家被抄了几次：

第一次是文革后不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我们家来了一群红卫兵，他们看见我有一个保险柜，要我打开它，交出其中的文件和档案。我假装上厕所，示意夫人把我听传达记的那些笔记本放在褥子底下，然后又回到外屋，对红卫兵讲，这个保险柜是国家科委给我的，里面是国家的机密文件，并告诉他们，我已通知国家科委，很快把这个保险柜抬走。他们大概也觉得“泄露国家机密”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于是接受我的劝说，走了。

第二次是又一拨红卫兵来索取我的文稿，我不好推说没有，只得自动将它们交了出来。一共是七大包，它们包括我建国后写的没有发表或者还没有完成的稿子。其中有讨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些问题和关于技术经济学的文稿，以及有关经济数学的演算，还有一些哲学问题的笔记。这七大包东西的面积和份量，现在估计一下，大约有二三公斤。他们拿我的手稿时，说是要审查，准备对我进行大批判用。理由很充分，我不能抗拒这种批判，所以忍痛交了出去。但我问他们要收据，他们却要我写了个共有七大包的单子交给他们，真是无法同他们讲道理。以后，这些东西便如石沉大海不知去向，也没有据此对我的批判。

第三拨来抄家的红卫兵，大致上是知道我都保存了一些什么东西的，“抄”的形式也还是“要”，没有翻箱倒柜。所以，我还是得以保留一些我想保存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抄出来也不会让我倒霉。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交出了我记的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讲话笔记。后来，我看他们自己在看我的那些本子，进行“学习”，这批抄走的东西，后来还是发还给了我。

到此为止，我的藏书还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只是书柜被贴上了封条，我没法再使用它们了。给我的书带来厄运的是“搬家”而不是抄家。

我搬家的原委是这样的，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主持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时，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仍然合用原来的那一栋大楼，两个单位的办公和住宿区都没有互相隔开。姚文元要常去《红旗》，认为中宣部这些黑帮住在那里，使他得不到安全感。他为了“纯洁环境”的需要，同时因为一些文革新贵关锋林杰之流对于我住的那个小院子的觊觎，我就被赶出原来居住的沙滩大院，时间是一九六九年，月份记不清了。

搬家的第一大损失是书。我原来有将近三十个书架，有两间房做书库。那时，我在沙滩那个小院的空间还算可以，而新分配给我的住房，一下子被压缩得不到原面积的四分之一了。人住着都不宽裕，对放不下的书就只好忍痛割爱了。于是，只得在搬家前，用小推车，一车一车地把我的这些书推到收废纸的地方卖掉。当时，只有中医书还可以卖几个钱，可以打百分之二十的折扣收购，我们就把它送到古旧书店。清理时，我只留下了我决不能处理的

书籍，如马恩列斯的全集，毛主席的书籍，工具书和一些大部头、成套的书和部分古典文学书籍。

我们的新居在史家胡同的一个院子里。原是一个高干的独家住所，我们搬进去后，加上文革后陆续搬进去的几家，这个院子一共就住了六家人。

在这儿，厕所是公共的，用水需从外面提进房间里，冬天我们自己买煤球，在屋子里生起了两个煤炉做饭、取暖。没有厨房，也没有洗脸间，书只好堆在靠墙边的地下。全家五口，起居都在一个大屋顶下，我们在房间里拉起了布帘……

生活虽然比过去艰苦多了，但远远离开“革命”的喧嚣中心，看不见那些红得发紫的人物，倒也有一些清静自在的感觉和家庭气氛。

#### ◇ 下干校前的准备

终于听到要去“五七干校”的消息了。

中宣部军管组组长是兰州军区的政委，因此，“五七干校”也就选在了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那时我还没有去过，能到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总是怀有几分喜悦的。

在文革中，我的精神比较愉快，这固然和我的性格有关，但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能得到夫人的照顾和安慰，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在住进牛棚之前，除了那次参加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大型批斗会以外，我一直在家居住，即使住进“牛棚”，也还在北京，况且时间也不算长。就是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我曾利用出来看病的机会，逾假不归，跑回家住了一夜。当我第二天回到“牛棚”时，等待我的是又一次的批判。

这次去宁夏这么远的地方，意味着与家人的长久分别，这就要做好精神上的准备。

当然还要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听说宁夏这个地方很冷，冬天很长，既是戴了黑帮帽子下干校，就不会冬天让你在室内“猫冬”的，这就要做好御寒装备。为此，夫人上街为我买了件不挂面子的光板老羊皮袄，我知道那个东西真能挡风。如果睡冷炕，容易得关节炎，所以又买了羊皮褥子。为了防止脚冷，又买了一双部队“退役”下来的方头毛皮鞋。

从我自己的身体来考虑，我有内痔，常常出血，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就去宽街中医院打了枯痔针。

能想到的夫人都替我去办了，直到想不出还要做什么准备时，离我出发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这时，我终于有了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我和夫人带着小孩子出去玩，在文革前期的这三年中，她们一直在家，没有玩的地方，也没有人陪她们玩过。一听说要出去玩，她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带着她们来到天安门，游了中山公园，让孩子们在儿童游乐场尽情嬉戏一番。最后，还在柏树前面照了相，享受了一下出远门前不知何时才能重聚的天伦之乐。



□ 摘自于光远：《文革中的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  
【不堪回首】

刻骨铭心的岁月——在父亲田家英离去的日子里

• 曾 自 • 曾 立 •

我们的父亲田家英原名叫曾正昌，自1948年起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他参与过许多党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是党内公认的秀才。然而他从不把自己看作为官之人，自称是“京兆书生”。就是这样一个书生，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为老百姓的利益讲真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的母亲董边，是和父亲一道从延安火热斗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1948年，在邓颖超大姐的引导下，她走上妇女工作岗位，一直在妇女战线奋斗了50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9年，母亲也去世7年了，然而他们的事迹却越来越广地被传扬，他们的品行、神采、精神、风貌化作不朽的人格魅力，每每令我们感动和欣慰。

今天，我们姐妹追溯一段苦难岁月中同父亲母亲共同度过的难忘往事，也许，记忆会告诉人们，什么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

◇ 天塌地陷的一天

1966年5月23日对于妈妈来说，无疑是天塌地陷的一天。

5月23日，下午3时，妈妈还在妇联机关里。上午，她在党组会上刚刚做完检查，缘起《中国妇女》杂志跟不上“文革”发展的形势，作为杂志的总编兼社长，她责不可卸。此刻，她并未因自己暂时交了账而内心稍得安宁，她更惦记着我们的爸爸。因为前一天，中央三人小组来到我家，宣布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在随后清理文件的过程中，爸爸一直闷闷的，什么话也没说。

23日早晨，父亲问妈妈：“中午回不回来？”妈妈想着要做检查的事，就答道：“不回来了。”她见爸爸靠在床上，似乎一夜未睡，安慰了他几句，可爸爸依旧未说什么。现在他会怎样了呢？一向颇有主见的妈妈，此刻心里却仿佛没有了着落。

妈妈正想着，突然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亲自打来的电话，让她立即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妈妈的心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妈妈坐的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在西楼会客厅，安子文、汪东兴在座。组织上对妈妈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难以令人置信的消息，使妈妈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妈妈只觉得天旋地转，欲语凝咽……她想不通爸爸为何要做这种极端的选择。

安子文一定要妈妈去看一下爸爸的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的路，妈妈不知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她的丈夫田家英“畏罪自杀”的事实……

在永福堂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爸爸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中办副主任汪东兴拉着妈妈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妈妈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床单被揭开，妈妈看到了父亲那张蕴积着无尽痛楚和悲愤的面孔。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妈妈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匆匆地离开了中南海的寓所。

临出门前，她看到爸爸的手表端放在办公桌正中，显然是爸爸有意放下的，妈妈只拿了这一件爸爸留下的东西。

在此后的整个“文革”期间，始终陪伴着她的，就是爸爸这唯一的遗物。妈妈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办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

当时我们姐妹正在师大女附中读初中。放学回家时，已被守候在中南海门口的工作人员拦住送往那里。当时我们无法想像、也无法理解家中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对为什么突然离开中南海这个温馨的、有着读不完的图书的家感到不解。我们向妈妈睁大了询问的眼睛。

那天的晚饭，我们是在丰盛胡同口的饺子馆里吃的。我们清楚地记得，坐在我们对面的妈妈，筷子夹着饺子，几次举到嘴边又放下，半天也没吃下一个。妈妈眼圈红红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有落下来。那时我们太幼稚，什么也不懂，但妈妈那强忍痛苦的眼神，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直到“文革”结束后，妈妈才详细地同我们谈起那个难忘而恻心的不眠长夜：照顾我们入睡后，已是夜深人静。可妈妈的心却波澜翻滚，反反复复穷诘的，就是爸爸为什么要自杀？

5月22日是星期天，就是爸爸去世的前一天，下午3时，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代表中央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的寓所，十分突然地向爸爸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田家英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因此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宣布后没有做任何解释，也不容爸爸说什么。戚本禹留下，他督促爸爸交文件。

从下午到晚上，妈妈都在帮助爸爸清点文件，包括爸爸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爸爸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其中有一份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是建国初爸爸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的笔记，由妈妈抄的。爸爸特别拿起这份文稿问妈妈：“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妈妈说：“交。我不怕！”爸爸这才把它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文件清点到午夜12点，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妈妈没有听清说了些什么，只听到父亲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爸爸气愤地对妈妈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戚本禹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中办秘书室工作，是爸爸直接领导下的一名普通干部。他个人表现欲强，不安心本职工作，曾屡受父亲批评。1963 年，戚本禹一篇带有明显政治批判色彩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使他崭露头角。不久，他被陈伯达调到《红旗》杂志社。在以后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戚本禹投江青所好，平步青云。

此时，戚本禹的电话是故意打来的，他仰仗江青之势施威风，使爸爸感到一种不堪忍受的侮辱。而这些情况，妈妈当时并不了解。

妈妈见爸爸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还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爸爸站着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妈妈，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18 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妈妈知道，爸爸把江青、陈伯达视为恶人，并不是近期的事。爸爸对江青既不敬、也不畏，避而远之。这种态度，江青也明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至于陈伯达，爸爸与他共事长达 25 年，对他贪人之功、谄过于人、心地偏狭的品行深为了解，并与之进行过长期斗争。

妈妈回忆起自己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爸爸：“你总是和陈伯达斗呀斗的，你们的斗争是什么性质？”谁料爸爸竟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当然是阶级斗争！他这个人是伪君子、野心家，不斗行么？”

想到此，妈妈有些难以推理下去，她了解爸爸对江青、陈伯达的一贯看法，并深知爸爸对他们从来不畏惧，可为什么今天却突然采取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妈妈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追溯道：“那晚我心如刀绞，彻夜未眠，我真悔呀！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够把问题看严重些，悔不该再去上班。现在家英义无反顾地去了，可孩子们还小，她们爱爸爸，怎么向她们解释呢？一切的一切，只有自己承担起来……”

◇ 妈妈第一个被揪斗

因父亲的牵连，妈妈成为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斗的“走资派”。

由于爸爸是“文革”初期最早被定性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妈妈很快就受到株连，这在那个时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她是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

历来严于律己的妈妈，太相信问心无愧了，以至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时，她居然端着水杯，拿着检查提纲，坐到讲台上发言。可没讲 3 分钟，台下就有人大喊：“她还以为是书记做报告呢？把她揪下来！”

妈妈立即被推搡到台下，被迫低头站着，大帽子一顶一顶朝她头上扣来，而且不容她分辩。当有人提出“董边和反革命丈夫一起开黑店，把持妇女杂志，贩卖封资修黑货”时，一位资格很老的女干部高声说道：“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

那位女干部的话立刻引起群情激愤，冲上来的人又把妈妈从台角拉到中央，喝令她交待更多的“罪行”。顿时，妈妈的心抽搐起来，爸爸去世前说的“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这时忽然在她脑际一闪而过。

妈妈是个自信心和个性很强的女性。她从小反对男尊女卑，她那向上的人生，完全是靠自我勤奋努力铺垫的。建国前夕，当组织上要她去党校学习时，她毅然选择了到邓颖超领导的中央妇委做妇女工作，一干就是10多年。

妈妈主持《中国妇女》杂志工作后，期刊发行量由初创时的5万份，扩展到90万份，成为全国四大刊物之一。妈妈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深得爸爸的敬重。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爸爸无话不谈。一次无意间问到我妈妈从事什么工作，得知是编刊物的，毛泽东笑着说：“原来也是个耍笔杆子的喽。”

由于爸爸在特殊的岗位工作，妈妈律己更为严格。搬入中南海后，我们家和杨尚昆、胡乔木等寓所相邻。他们是爸爸的领导和挚友，他们的夫人李伯钊、谷羽，也是妈妈在延安时的领导或女大同学，关系很熟，但她没事从不去串门。

她反对夫显妻荣，看不起靠丈夫提携的人。可现在黑白完全被颠倒了，仅仅因为丈夫的“问题”，自己就被推入遭人任意诬陷的泥淖。她此时才对“运动可能升级，更大的打击和迫害还在后面”有所预感。

这一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消息，点了妈妈的名——“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董边，罢了她的官，夺回了这个宣传阵地。”从此，批斗接踵而至，妈妈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的万人批斗会上挨批，严酷无情的打击，使她因精神过分紧张，得了小便失禁的毛病。

因她是见了报的黑线人物，于是劳改和体罚就成了家常便饭，任何人都可以对她凌辱和谩骂。冬季，她要为办公大楼生炉子。而造反派要求人们上班后不能闻到烟味，为此妈妈每天早晨5点就要起身到机关生炉子，因为只有这样，上班时炉火才能很旺，没有烟。

妈妈在战争年代落下哮喘的病根，为了防止烟呛犯病，她必须用一只手死死地捂住嘴干活。

◇ 饱受创伤 女儿懊悔

子女的误解，无疑给妈妈心灵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可她不能解释，不能让子女对党有半点怀疑。

在妈妈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每读一次，便陷入深深的遐想，久久不能自拔。“‘文革’中我从未想到过死，但有时被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那时我只想‘要坚持活下去。家英留下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再有，也确实是为了孩子。被开除党籍那天，我伤心地哭了。我想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却不要我了，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孩子们还需要我，她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将来会转过来的。她们的父亲死了，我要是再不在了，她们将来的命运该怎么样呢？一定要活下去，怎么样也要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特别是我们隐约地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一起涌来。自幼所受的教育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反党、反毛主席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状。可给我们这种教育的，不仅是学校、社会，还有父母啊！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而那个时期的逻辑又非常简单，非此即彼，我们必须在父母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当任何一种选择都难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宁时，我们便由一个柔弱的女孩变得有些暴戾。

我们不再唤妈妈为“妈妈”；在生活中，妈妈只要对我们的做法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反驳：“还说我呢，你自己的事还没好好交代呢！”每当这时，妈妈的脸就涨得通红，却不辩解不吭声，埋头做她手中的活儿。

我们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妈妈每天都在承受着怎样的诽谤和诬陷，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如今，当我们明白自己彼时的言行，是在妈妈心灵的创口上撒了一把盐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悔恨呀！

作为妈妈，她何尝不渴望得到自己孩子的理解，但她绝不愿意让孩子对党产生半点怀疑。对父亲的自尽，以及她的“问题”，如果她都采取否定党的态度，不仅不能使我们转过弯来，而且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所教育我们的一切。

“文革”中，妈妈从未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她把一切波澜都压在自己的内心，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感到平静，感到跟非“黑帮”的孩子们差得不太多。她把挨斗时挂的牌子深藏在褥子底下，不让我们看到。那时粗粮、细粮有比例，妈妈宁愿自己一天吃三顿窝头，却不声不响地把馒头推给我们。

从1966年5月23日到7月中旬近两个月之中，我们被迫搬了5次家，最后落脚到灯市口妇联宿舍大杂院内一间仅12平米的平房。在这小小的陋室，留下了我们母女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房子太小了，放下一大一小两张床，就再放不下什么了。为了让我们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把墙挖出一道沟，把大床往沟里靠，挤出了一点空间。当小桌子终于塞进两床之间时，我们开心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晚上，看见我们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妈妈是那样安详，那样欣慰。

同妈妈住陋室一年多的生活，即朦胧又清晰，既茫然又温馨。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只见过去不停工作的妈妈，也会缝缝补补，也会蒸玉米面窝头、菜团……有时她情绪松弛时，还和我们一起抛沙包。她一边抛，一边背诵毛主席诗词，看谁抛得多，看谁背得长……

妈妈知道妹妹曾自喜欢唱歌，就让她当老师。“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妈妈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总嫌她唱得不标准，可她挨了批评仍然很高兴。只有这时，她似乎才能暂时把烦恼抛至九霄云外。然而在这短暂的欢愉之外，妈妈的大部分时间是被苦恼缠绕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们，“文革”期间，除了爸爸去世，对她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目睹黄甘英同志遭逮捕。那天她正和黄甘英等人在机关劳动，一辆吉普车骤然停在身旁，下来两个军人，不由分说给黄甘英戴上手铐推入吉普车。也不知道她被什么人抓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妈妈心里明白，那就是她的被抓是受彭真一案的牵连。彭真的亲戚尚且如此，作为田家

英的妻子，又怎能逃脱劫难呢？妈妈做好了随时被关押的准备，坐牢她不怕，唯一放不下丢不开的是我们。

在回忆当时心境时，妈妈写道：“那几日，我心里苦闷极了。下午5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就坐在床沿向着窗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盼着二英回来。她当时才15岁，头顶上扎两个小短辫，只要远远看见两个小辫一上一下的，就知道是二英来了。能看见孩子，那时对我是唯一的安慰。”

◇ 一家人天各一方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们姐妹分别离京奔赴边疆。姐姐在内蒙古草原放牧8年；妹妹到东北插队，最后全公社只剩下曾自一个知青。

就在我们下乡之初，妈妈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的妈妈，不能和孩子通信，但她也和其他母亲一样，时时刻刻惦念着自己远行的儿女。她每月发12元生活费，她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着。终于攒了5元钱！当曾立拿到妈妈托人捎给她的全是毛票的5元钱时，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落。

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保持着进取的心态，我们精神的支撑之一，是来自想念中的妈妈。我们从不谙世事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对母亲从隔膜到理解，到心心相印，直到将刻骨铭心的母爱融入生命。

1971年的春节好难忘啊！历时两年天各一方的母女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妹相约来到妈妈的干校。我们分明地感到了自“文革”后妈妈从未有过的喜悦。

黑瘦黑瘦的妈妈，体重只剩下80来斤，我们不禁偷偷落泪。妈妈是猪场的饲养员，这在干校算是最脏最累的活了。我们拼命地帮她干活，挑泔水，粉碎饲料，恨不能将一年的饲料都备齐，好让妈妈在日后减少一些劳累，稍得喘息。

曾立手巧，踩得缝纫机嗒嗒响个不停，一件旧黑呢子大衣，被翻过来，絮上棉花，做成一件崭新而松软的棉大衣。以后的许多年，妈妈就是穿着这件大衣，才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记得妈妈曾对曾自说：“等我死了，就穿你姐姐做的那件大衣走，是它一直伴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 他更像个“勇士”

妈妈渐渐感到：父亲虽然常常自称是“京兆书生”，但在许多时候，他更像个“勇士”。

记得“文革”中，曾听妈妈说：“你爸爸就这样去了，他太不负责任了。”那时稍明事理的我们也觉得：是啊，爸爸怎么能不把问题说清楚就永远闭上了嘴，任人抹黑泼污水；又怎能忍心抛下妻子和孩子，而把一切的重负都让妈妈一个人来承担呢？因此对爸爸的死，始终是妈妈和我们苦苦思索的问题。

爸爸刚刚去世时，中组部、中央专案组多次找妈妈谈话，要妈妈揭发父亲。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他们对妈妈的交代非常不满。

出于对党的忠诚，妈妈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而这件事，她认为是需要如实汇报的。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再次派爸爸带队到湖南等地农村做调查，检查基层对“人民公社60条”的落实情况。然而工作组下去3个月，听到的群众呼声都是要求“包产到户”。

6月底回京后，爸爸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先酝酿一下。他要父亲在主席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父亲的工作做了一圈，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

父亲认为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同时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的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再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他深知毛主席是重视实事求是的。他把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都准备好，只待毛主席返京即汇报。

然而事实同父亲的想像很不同。毛泽东在听父亲讲述意见和主张时，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汇报第一句话就向父亲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父亲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熟悉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看法，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报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父亲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没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主席听后没做任何表态，很快就让父亲离开了。

父亲从主席那儿回到家中，情绪很不好，闷闷不乐。父亲工作中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妈妈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明显感到父亲带着思想情绪，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父亲没有避讳，向妈妈倒出了一肚子话。

妈妈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父亲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你只不过是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父亲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是明白地在说是少奇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少奇身上推，不就是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意见，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我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妈妈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此事也只在他们夫妻之间议论而已。很快，在北戴河会议上，父亲因主张包产到户挨了批，这事就更不复提起了。

当“文革”初期被形势逼得很紧的时候，妈妈冥思苦想，就想到这么一件跟父亲议论中央领导的事来。她准备将此事向组织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就被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打断了。妈妈最初还纳闷：没说时，一再逼我；这想起点儿来了，又不让说了。

随着运动的升级，刘少奇也被当作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妈妈这时才琢磨明白，那位负责人的及时制止意味深长：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自己头上。而现在更不能让此事从自己口中传出去，以至牵连更多的人。

或许是由于被迫交待问题，或许是就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思索，或许是因为斯人已逝，妈妈开始了对父亲的追忆和重新认识。父亲常自谓是“京兆书生”，不是个做官的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欣赏“书生”，看似降低了标准，但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显示出父亲不见风使舵、敢直言己见的“书生”气是多么难能可贵。

爸爸自己很少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他因工作特殊，靠近中央核心领导，又了解内情，按说应有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条件，他的人生历程本可以平平稳稳。可自建国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次大的湍流曾几乎将他吞噬，可他并未放弃他认为应该坚持的真理，而为此变得谨小慎微。像爸爸这样的“书生”，其实更接近于勇士。

1962年8月，因包产到户问题，父亲在北戴河会议上挨了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刮“单干风”，并分析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时江青乘机给爸爸扣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到处宣扬。毛泽东也认为爸爸思想右倾，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

那时赋闲的爸爸心里非常苦闷，几次同妈妈认真地商量，提出想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妈妈性情耿直，虽然她并不认为爸爸在大的路线或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父亲的为人。他即便犯了错误，也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出以公心。因此，她完全支持赞同爸爸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爸爸一起下去。她对爸爸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同志，向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

爸爸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主席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爸爸，又向主席表露了想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主席仍然没有同意，还送了爸爸一句话：你也想搞本本主义啊。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在谈到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时，他讲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毛泽东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在整理这个讲话时，爸爸不顾关锋的反对，坚持“历史剧和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回北京后，同时参加谈话的胡绳同志，到永福堂寓所，与爸爸反复磋商如何整理主席的讲话纪要。妈妈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互相对笔记时爸爸手持香烟紧锁眉头的样子。

10多年后，妈妈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将“讲话”整理成纪要，最初是田家英提出的，他是中办副主任，从中办的职能出发，凡主席重要的讲话都要整理成文。关锋是整理纪要时的执笔者。在杭州时，关锋对田家英坚持删去“海瑞罢官”一段，只提出了“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意见，家英没有理他。回京后，他用诡秘的手段向江青告了状。因此纠缠不休，非要把那句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了。家英

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敏感。但他所坚持删去的是主席通篇讲话的“要害”，当时家英和我都不是那么明确。然而从我和家英的接触中可以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的这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时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胡绳同志在1991年故地重游，漫步西湖边，思及1965年末在杭州的那段日子，十分怀念故友家英。他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回京后，他把这首《怀家英》的诗写成条幅送给了妈妈。

在失去主席信任后，爸爸仍然敢于把毛主席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删去，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讲话的“要害”，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妈妈了解爸爸的性格，他不喜人云亦云，更厌恶那种为了个人的目的随波逐流的人。删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最终成为爸爸“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主要罪证。

1966年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爸爸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他忧心如焚。妈妈记得是这年3月，爸爸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当他拿着图章给妈妈看时，还对她解释了为何要起这么个斋号：“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田家英一贯右倾，说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他都不赞成。还严厉地指责爸爸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爸爸早已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了，这话是秀才朋友传过来的。主席对爸爸的看法在父亲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他没有向妈妈提及此事，或许他正是以“无我有为斋”的斋名，吐露了他悲凉的心态。

可惜的是父亲虽肯“忘我”，却无力回天。而耿直的妈妈，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

逝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爸爸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而一个勇士的死，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怜惜与思考……

在妈妈对爸爸深深的思念与冷静的回顾中，真正地理解了爸爸，因而她牢牢地记住了爸爸的遗言：不会冤沉海底。她期盼爸爸冤雪案翻那一天的到来。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以她的顽强和慈爱激励温暖着我们。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